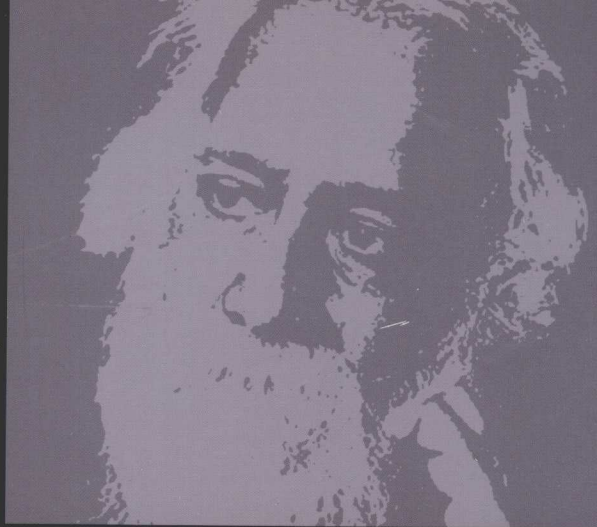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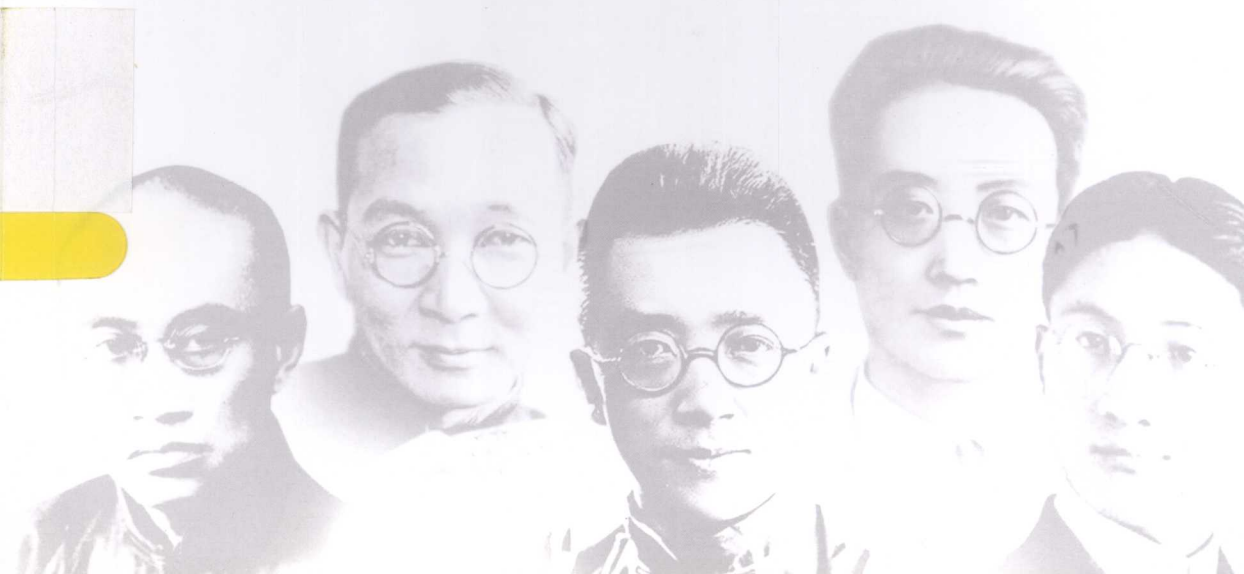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s

泰戈尔与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孙宜学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泰戈尔与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孙宜学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孙宜学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9

ISBN 978-7-5426-5308-6

I. ①泰… II. ①孙… III. ①泰戈尔, R. (1861~1941)—影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663.5②K833.5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6210 号

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著 者 / 孙宜学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9.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308-6/K·336

定 价 / 4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2351

本书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百年东方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冲突与融合：以泰戈尔与中国为例”(2013BWY004)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泰戈尔学建构关键问题研究”(14BWW025)的阶段性成果。

从泰戈尔到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标准(代序)

陈思和

今天的会议主持者指定我讲这个题目，其实，什么叫“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标准”？好像在我的印象中，是没有的。据我所知，好像诺贝尔文学奖的任何一个评委都没有设定过针对东方作家的“东方标准”。我记得马悦然先生有一次在复旦的演讲中说过：“我们只是把奖给一个好作家，从来没有考虑过（其实是考虑过的——引者按）给一个什么国家的作家。”那么，按照这个说法，就不存在东方标准和西方标准，它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文学标准。但恐怕实际上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曾经有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萨特，他拒绝去领奖。当年他说过一句话，好像是：这个奖是给西方的作家和东方的叛徒，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也记不得了。但这个概念很令人费解，“东方”也许不是指亚洲，而是指社会主义阵营，那么，究竟是指文化的叛徒还是政治的叛徒？或是体制的叛徒？萨特也没有明确界定。

有一个英国人，在1913年泰戈尔获奖后，写评论夸奖泰戈尔，说他是作为英国人获奖的。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是泰戈尔的英文非常好，好到让人搞不清楚他是不是英国人。他们认为泰戈尔的英文水平就像英国人一样，足以体现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是如此深入，已经可以使得一个殖民地的作家用宗主国的语言来写诗，甚至连宗主国的人们都分不清他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我想，这其中还是有点标准的，我们马上就想起了莫言得奖后，很多汉学家和研究者都说，莫言得奖是葛浩文，还有其他翻译家翻译得好。前几天我在香港开会，和顾彬在一起，顾彬也说：“莫言得奖其实是葛浩文得奖。没有葛浩文的翻译，莫言是得不了奖的。”这和那位夸奖泰戈尔英文好的英国评论家

的意思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眼里,得奖的是“英文”的泰戈尔和莫言,而不是印度的泰戈尔或是中国的莫言。这样看来,在潜意识里,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有一个标准的——首先他得是一个英语作家,或是一个瑞典文的作家,很多人说莫言得奖是因为葛浩文在翻译时把作品都改了,改成外国人看得懂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有一个潜在的东方标准的,这个标准未必讲得清楚,但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从这两个作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们本身是什么样的,以及世界是如何看他们的,来判断东西方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以及这些评价基本依据一种什么标准。通过这些获奖作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在西方人眼里他们为什么可以得奖。

但我自己对这个“东方标准”是很怀疑的。东方文化是否具有世界意义,其实我也有点怀疑。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地球村,在这个地球村里,所有的种族,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按照这样来理解,我们中国的作家,即便不得奖,他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如果说这个世界的文学缺少了中国,缺少了印度,缺少了四分之一人口的阅读,这个世界文学成了什么?但问题是,我们现在都不愿意这样来思考,我们觉得在欧洲得了奖才是走向世界,好像我们永远在世界外头。这种所谓的“走向世界”观点,我认为对整个地球以及世界人类的文化是不公正的。过去,我在讨论世界性因素的时候一直强调:我不认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由于得奖才进入世界视野,每一个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无论什么宗教民族的文学都是具有世界性的,这其中只是一个交流的问题,有的交流得比较频繁,有的交流得比较少,但它仍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但现在我们做不到,我们心目中的世界就是欧洲。举个例子,我们中国的富翁,像陈光标这样的,让他设一个陈光标奖,我们奖给一个美国诗人或英国诗人,让他到北京去领奖,或者到上海,到山东去领奖,这个拿了几百万奖金的诗人会不会说:“我现在走入世界了”。我想他不会这样说。我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着某种不正常的秩序,还是有圈里圈外的,有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分。

“从泰戈尔到莫言”这个说法也挺有意思。如果就是泰戈尔和莫言,那么就是两个人,但是从泰戈尔到莫言,那么就有五、六个人,还有刚才提到的日本作家、以色列作家,亚洲分东亚和西亚,我们讲的不是波斯文明或是犹太文明,而是东亚文明,是从泰戈尔,到川端康成,再到大江健三郎,还有一个身份暧昧的中国人高行健,然后才是莫言,严格的说,只有莫言是具有中国国籍的诺贝

尔奖得主。因为我们现在掩耳盗铃不承认高行健是中国人，其实我们都读过他的作品，毫无问题是属于中国的。从这一批东亚人和欧洲的关系，或者是欧洲人如何理解东亚人，我想讲的是三个方面，首先是文化的问题，再者是政治的问题，最后是理想的问题，这三者都不是文学的问题。文学是语言构成的，如果他们不懂中文的话，很难谈文学。

首先是文化的问题，尽管泰戈尔得奖的时候，有人称赞他英文好得和英国人一样，但我想泰戈尔自己是很明白自己身份的。他是一个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东方人，所以当泰戈尔得奖后，他到苏联去访问，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是来自于英国治理下的臣民”。但是他访问中国、日本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态度。他说是以一个东方文化的代表来寻找自己的亲人兄弟。当泰戈尔拿了这个奖，面对西方的时候，他希望人家把他看成是一个东方文化的代表。印度当时被英国殖民，它的文化已经失散了，所以他跑到中国、日本来寻找东方文化的知音。

泰戈尔得奖后，1921年在美国同当时还是学生的冯友兰有一次对话，冯友兰当时就问他：“你怎么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泰戈尔回答：“很难说。西方文化是一个根源，从古希腊、希伯来一路走来，英国、法国、美国，它们之间的文化是同一个东西。而东方文化则不然，印度有印度的根，中国有中国的根，日本有日本的根，彼此之间是没有往来的。所以泰戈尔认为他是第二个唐僧，重新来交流彼此间的文化。而且他觉得印度是被殖民的，中国是半殖民的，日本是去殖民人家的，在这三个完全不同的国家里，东方文化是怎么保留和发展的？泰戈尔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也努力进行东方文化的融合。他创办的国际大学就想在其中实现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的大融合。我觉得泰戈尔的这个想法非常了不起，当时中国就没有人这么想。

作为一个诗人的泰戈尔，中国人相当欢迎，他的诗在中国影响非常之大。但是他来中国演讲，受到一片骂声。骂他的人主要是陈独秀、瞿秋白、沈雁冰等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为什么这些人对泰戈尔的诗那么欢迎，如陈独秀是中国第一个翻译泰戈尔诗歌的人，发表在《新青年》上。郭沫若也说：“我是受了泰戈尔的影响才开始写诗的”，他对泰戈尔非常崇拜。可是，当泰戈尔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激烈地抵制泰戈尔，甚至想把泰戈尔赶回印度去。因为，泰戈尔讲的东方文化在当时中国是不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认同的。他们认为这种文化就是封建专制的文化，是已经丧失生命活力的文化，当时陈独秀

也好、瞿秋白也好,甚至是胡适这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对泰戈尔的理念都不认同。所以,泰戈尔跑来中国找亲人、兄弟,却没有找到,他们都不认同他。但是,如果今天泰戈尔来到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一定是把他看成是东方文化的象征,像传统的儒家、道家等“国学”代表都会愿意接受他。因为今天的中国和印度都已经不是受压迫的国家了。但我还是表示怀疑,其实“五四”对中华文化的反省在今天是受到抵制的,现在人们习惯于贬低“五四”的新传统,认为这是全盘西化,是反传统的。我是受到“五四”文化教育的,在这个立场上,我想重新发现我们的东方文化到底是什么?

其实,鲁迅这样的现代作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做这样的工作,尤其是莫言。莫言是不讲老庄孔孟的,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但你不能说莫言没文化,他是有文化的,他的文化就是深深扎根在中国社会底层老百姓中的文化。以他的《生死疲劳》为例。《生死疲劳》讲一个地主被枪毙,地主心里不服,他到阎王那里去告状,我没有罪为什么要枪毙我,阎王说你要告状就罚你做驴,做驴死了还要告状,就变牛,做牛死了再告状就变猪,变猪了还要告状就变狗,狗死了,阎王问他还要告状吗,他说不告了。阎王说,不告了我就让你再做一次猴子然后就可以做人。最后他做了一次猴子后投了人胎,又做人了。表面上看,这部小说里的阎王和人世间的领导人相勾结,要对死亡者进行思想改造。但读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经历了六道轮回后,他投入胎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故事,从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那天讲起……,而这也是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此时我突然感到,这就是民间那种坚忍不拔的追求真理,追求真相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聊斋》中的席方平的诉讼精神。所以,莫言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东方文化和当年泰戈尔所说的东方文化,或者与我们今天弘扬的国学——什么儒家道家完全不一样了。莫言所说的东方文化真正是与我们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的不间断反抗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的文化,这才是我们东方真正的文明。由于东方国家长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压迫,我们也已经习惯说东方文化是温良恭俭的,是仁义道德的,而我们真正的文化反而都看不见了。而莫言正是向全世界揭示了这样一种文化。

以上是2013年6月1日我在同济大学举办的“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研讨会上的即兴发言,原打算从文化、政治、理想三个方面来讨论中西文化撞击下的东方文化百年的自身演变。因为发言时间限制,第

一个问题还没有讲完就到时间了。后来会议要出版论文集，我就换了一篇其他文章递交过去，而这篇讲话开了头就没有写下去。难得孙宜学细心，让同学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他的近著是讨论中国现代作家与泰戈尔的关系，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他希望我这篇未完成的讲话稿能够作为他的近著的序言。我本来是应该写完这篇文章才交出去的，但是我最近手头正在忙于校订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英译工作，无法静下心来讨论泰戈尔与莫言的题目，而宜学的书稿也出版在即，只能如此草率地从命作为代序。特此说明。

2014年7月27日修订于鱼焦了斋

CONTENTS

目

录

从泰戈尔到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标准(代序)

陈思和 / 1

雾锁泰翁皆缘君——梁启超与泰戈尔 / 1

中印友谊之桥的两岸——蔡元培与泰戈尔 / 9

从一枝独秀到一枝“毒”秀——陈独秀与泰戈尔 / 17

以佛报国空亦真——戴季陶与泰戈尔 / 33

东方两圣人——辜鸿铭与泰戈尔 / 49

始乱终弃不因情——郭沫若与泰戈尔 / 64

君子之交淡如水——胡适与泰戈尔 / 87

孔门两圣贤——梁漱溟与泰戈尔 / 100

耶稣空悲切——林语堂与泰戈尔 / 110

“撒提”东来不适应——鲁迅与泰戈尔 / 118

“矛”“盾”相击听将令——茅盾与泰戈尔 / 134

纨扇绣诗——梅兰芳与泰戈尔 / 143

从“森林”到“国家”——瞿秋白与泰戈尔 / 148

佛法无边世为岸——太虚法师与泰戈尔 / 159

诗圣精神的中国传人——谭云山与泰戈尔 / 170

私淑诗哲爱为真——王统照与泰戈尔 / 179

白马赠翁开新风——徐悲鸿与泰戈尔 / 202

中国儿子“素思玛”——徐志摩与泰戈尔 / 211

“玄学鬼”缠上泰戈尔——张君勱与泰戈尔 / 236

中国传播泰戈尔第一人——郑振铎与泰戈尔 / 249

中国青年之友与敌——周作人与泰戈尔 / 268

中国的泰戈尔追悼会 / 277

附录：诗人之爱与政治家之谋——蒋介石与泰戈尔 / 284

末代皇帝的印度时光——溥仪与泰戈尔 / 291

乡村自治难移植——阎锡山与泰戈尔 / 295

后 记 / 301

雾锁泰翁皆缘君 ——梁启超与泰戈尔

在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过渡、转化的过程中,梁启超无疑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他既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具有了世界性的眼光,能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境、大框架下,以“文学救国论”为中心,通过各种形式,输入西方文化,希望借以救亡图存。但1918底至1920年的欧游经历,使其目睹了西方文明导致的满目疮痍,从而刺激他由反中国传统文化又回归到中国文化传统,由激进回归“保守”。泰戈尔进入其视野并受到欢迎,与其前后的思想变化都密切相关。而国内思想文化界对其与泰戈尔关系的各种复杂态度,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现出了中国近现代以来思想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及矛盾性。

初缘——《大中华》视野中的泰戈尔

中国对泰戈尔的第一次全面介绍,归功于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杂志。

《大中华》杂志创刊于1915年1月,目的有三:“一曰养成世界智识;二曰增进国民人格;三曰研究真理真相以为朝野上下之南针。”梁启超作为主编,明确提出杂志的天职是关心“中国之前途,国民之自觉心”,“并能了然于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以免陷于绝望苦闷之域”,了解“欧洲之原因结果,中国之存亡盛衰。”^①《大中华》贯彻了梁启超的办刊思想,并成为介绍外国思想文化,打开国人视野,增强国民世界智识,促进中外文化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其中对泰戈

^① 《大中华》“发刊辞”,《大中华》,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

尔的介绍和研究,在国内也堪称先驱。

1916年2月20日,《大中华》杂志(第2卷第2期)发表署名仲涛的文章《介绍太阿儿》,并附有“太阿儿手札”一幅,“太阿儿最近写真”一幅。同年,第2卷第8期刊出逐微所译《印度大思想家太阿儿自传》。在《大中华》杂志满纸“欧风美雨”中刊发有关泰戈尔的文章,一是因为泰戈尔为“印度文明之代表者,为东西两洋文明之调和者,为今后世界新思想之开宗者;”^①同时也是因为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英国和日本受到了热烈欢迎。梁漱溟深谙此种心理,一语中的地批评梁启超等介绍印度文化,只是对西方泰戈尔热的随声附和。^②

仲涛之文侧重强调泰戈尔在欧洲的影响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他称泰戈尔不仅仅是诗人,还是“预言者、哲学家、宗教家、教育家、印度之爱国者,梵界之中兴伟人。”并预言泰戈尔将开辟世界文明史的新纪元。让他觉得遗憾的是,现在亚洲出现了这样的伟人,连欧洲人都“伏地摩太阿儿之足以致最隆之敬”,而“吾震旦人士,至今无能称太阿儿者。巷有颜子而不知,耻矣。”逐微的译文则简明扼要地全面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及其政治观、宗教观、文学观。实际上,这两篇文章彼此互补,可以称为中国最早、最全面的泰戈尔研究。这也是梁启超与泰戈尔首次结缘。

真挚友谊——泰戈尔在北京

名闻世界的泰戈尔主动要来中国,讲学社能出面邀请并承担接待任务,实际上是求之不得。

讲学社成立于1920年9月5日,是梁启超以罗素访华为契机而发起成立的,核心人物有林长民、蒋百里、徐志摩等。梁启超形象地将讲学社比作一个大商店:“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 “只要是有价值的学说,我们不分门户,都要把他介绍进来。好像我们开一个大商店,只要是好货,都要办进,凭各人喜欢买那样就买那样。”“我们要大开门

① 仲涛:《介绍太阿儿》,《大中华》,第2卷第2期,1916年2月20日。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4页。

户,把现在有价值的学说都要欢迎,都要灌输。”^①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民间的、但与政治又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团体,讲学社的成员身份复杂,思想主张差别很大,有主张玄学的,也有主张科学的,有西化派,也有传统文化派,但在欢迎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一事上,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泰戈尔来华前,讲学社已经邀请了罗素、杜威、杜里舒来华,其中主谋,都是梁启超。

梁启超极其重视泰戈尔访华,并事无巨细地安排泰戈尔访华的相关事宜。如就泰戈尔在华住所问题,他在3月7日致好友蹇季常的信中就特别指出:“独太戈尔房须别觅,真是一问题,渠不过一个月后便来,非赶紧设法不可。我想城里找适当的很难,最好是海淀,其次则香山……”并专门提出要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张彭春帮忙料理。^②此外,泰戈尔在北京期间,梁启超还身体力行,与泰戈尔几乎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他的儿子梁思成也经常出现在各种欢迎会上。

4月23日下午3点,泰戈尔一行抵达天津,梁启超特意赶到天津车站迎接;

4月23日下午7点,泰戈尔抵达北京火车东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到车站迎接;

4月24日晨,梁启超等在泰戈尔寓所叙谈一小时;

4月25日下午,梁启超等陪同泰戈尔游北海,5点左右,梁启超主持欢迎泰戈尔茶话会,并致欢迎辞;

4月26日下午和27日上午,梁启超分别在北京师大和北京大学演讲,作为北京迎接泰戈尔的“预备的谈话”,题目分别为《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和《绝对的爱》;

27日晚,梁启超参加了北京各学界代表在海军联社为泰戈尔一行举行的公宴;

4月30日,经梁启超协调,清华大学热情邀请泰戈尔一行入住清华园,并驻留近一周;

5月1日下午,梁启超在清华演讲“中印文化之关系及太氏之介绍”,为泰戈尔当晚的清华演讲造势,“梁先生精神奋健,其气概诚令人钦佩,同学听讲

① 《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况》,《晨报》,1920年11月10日。

②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10页。

后,受益良深;”^①

5月8日晚,北京各界为泰戈尔庆祝64岁生日,梁启超赠泰戈尔中国名竺震旦,寓意“从阴郁暗淡的状态里轰然一震,万象昭苏,刚在扶桑浴过的丽日从地平线上涌现出来”,并“希望我们对于他的热爱跟着这名儿永远嵌在他心灵上。我希望印度人和中国的旧爱借竺震旦这个人复活过来”^②;

5月9日上午,讲学社邀请泰戈尔给北京青年作第一次公开演讲,梁启超在正式演讲前向听众介绍泰戈尔;

5月20日中午,梁启超和梅兰芳等设宴为泰戈尔饯行,期间梁启超向诗人求诗:“这次诗人漫游中国,必有佳句,以志鸿爪?”泰戈尔以《洛神》为题,赋诗一首,书于纨扇,赠予梅兰芳;^③

5月20日晚,泰戈尔一行由北京出发赴晋,梁启超等到站欢送。

泰戈尔深感梁启超的盛情,并非常珍惜与梁启超结下的深厚友谊。他回国后出版了在中国的演讲集:“Rabindranath Tagore: Talks in China”,其“序言”,即梁启超在北京师范大学为欢迎他所做的演讲。

指“泰”骂“梁”——谁别有用心

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各种文化论争都不是真正的文化之争,而是在论争什么样的文化可以强国,从这种角度看,泰戈尔作为一位亡国诗人,本身就没资格来给尚未亡国的中国人上文化课。在中国当时复杂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背景下,泰戈尔的身份和主张使其不知不觉变成了国内思想矛盾冲突的新靶子,成为论争各方借以攻击对手的工具。梁启超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受害者,”他对泰戈尔的真诚欢迎,被其批评者视为别有用心;他对泰戈尔的赞扬和辩护,被指责为费尽心机遮掩泰戈尔来华的真实目的,故意使人看不清泰戈尔作为诗人、哲学家的真正价值,从而将泰戈尔变成与中国世事隔绝的可居的奇货,变成可用于抬高自己的身价、借机炫耀自己的宝贝。

批评者这样指责梁启超似乎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出面邀请泰戈尔的是

① 《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② 《竺震旦诞生与爱情名剧“契袂腊”》,《晨报》,1924年5月10日。

③ 梅兰芳:《忆泰戈尔》,《人民文学》,1961年5月号。

梁启超所主持的讲学社，而对泰戈尔来华最热心宣传的《晨报》又是梁启超主持的“研究系”的机关报，泰戈尔在京期间，几乎所有的招待啊，欢迎演讲会啊，等等，都能看到梁启超的身影。当泰戈尔被攻击为封建腐朽人物时，梁启超则公开为之辩护说：“新旧非年岁问题，乃精神问题，亦非皮相问题，乃骨髓问题，今泰戈尔年岁虽老，而精神则犹是活泼泼之幼儿。其衣冠虽古，而其思想则足为时代之先驱。彼之取得世界上之地位，乃挾印度千年前之文化而复得之，乃以革命及反抗之精神取得。”^①

梁启超就是这样处处赞扬泰戈尔，时时维护泰戈尔，使人很难不相信他在处心积虑“袒护”泰戈尔，所以批评者就很自然地将其与泰戈尔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批评者认为梁启超作为正受到进步思想界批判的“玄学鬼”和“研究系”的代表，因为在论争中失败了，所以才拉来泰戈尔这位与他观点一致的世界级大师来助战。如陈独秀就常常将泰戈尔、梁启超、研究系、封建军阀相提并论。“有一小研究系，向散布反对太戈尔传单的青年说：‘你反对太戈尔，何不去反对曹锟？’”^②“研究系的人，一面崇拜欢迎太戈尔，一面却主张中国人带了枪炮到蒙古去！”^③“太戈尔一到北京，竟染上了军警和研究系的毛病，造谣诬陷而已。”^④并称梁启超和泰戈尔“携着手大倡其心灵生活与精神文明”，犹如自己吃饱吃撑了，却忘记了普天下人的饥饿，“好个没良心的东方文化的代表者！”^⑤不知这是梁启超沾上了泰戈尔的晦气，还是泰戈尔替梁启超背了黑锅。

而真正对泰戈尔别有用心者，恰是借泰戈尔批评梁启超别有用心的人。

泰戈尔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受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异常尖锐的批评。有人批评他是过时人物，只该与古人把酒当歌；也有人说他是政客，不是诗人，甚至骂他是帝国主义政策的间谍，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郭沫若否定泰戈尔的哲学可使东方民族起死回生；吴稚晖讽刺泰戈尔所提倡的主张无异于把融合了大小乘佛教的诗篇，贴在城墙上抵抗敌人的机关枪；林语堂则讽刺泰戈尔是因为暗杀、革命、宪法改革都干不了，或不想干，于是才采取最无

① 《泰戈尔昨天讲演纪略》，《晨报》，1924年5月10日。

② 陈独秀：《反对曹大总统？马蜂桥四号！》，《向导》，第62期，1924年4月23日。

③ 陈独秀：《崇拜太戈尔的主张派兵征服蒙古》，《向导》，第62期，1924年4月23日。

④ 陈独秀：《太戈尔与金钱主义》，《向导》，第68期，1924年6月4日。

⑤ 陈独秀：《太戈尔与梁启超》，《向导》，第63期，1924年4月30日。

聊的精神安慰法；瞿秋白则尖锐地指出泰戈尔要东方人对侵略者施以“慈爱宽恕”的“东方文明”的危害，认为泰戈尔“应当鼓励奴隶和平民的积极、勇进、反抗、兴奋的精神，使他们亲密友爱的团结起来，颠覆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①；沈泽民则认为泰戈尔提出的“人类第三世界”的理论“可谓迷恋骸骨，与中国现在一般国粹派，毫无二致。这种思想若传播开来，适足以助长今日中国守旧派的气焰，而是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大敌！”^②

泰戈尔在中国宣传以爱对抗暴力，很少谈到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主张，而欢迎者，包括梁启超在介绍泰戈尔时，也很少谈及泰戈尔思想中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的一面，而只一味强调他反对西方物质文明，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结果不少中国人，特别是有政治背景的人就认为泰戈尔是站在崇古复古的立场上反对现代化，是美化封建秩序和封建意识，是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是以抽象的人性论腐蚀人们的革命斗志，所以觉得有必要消除他在中国造成的消极影响。这也难怪，因为即使欢迎者如徐志摩也觉得泰戈尔的主张“差不多是虚设的。”^③

泰戈尔来华，实际上成了当时国内各种思想学派、政治势力表明自己立场和态度的一个导火索了。陈独秀所说的“老少人妖”，茅盾所说的“别有动机”“邀请太戈尔来中国‘讲学’的‘学者、名流’”，指的就是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东西文化论争、科学玄学之争、传统与现代之争中的文化保守派，如将泰戈尔比作千年前的鸠摩罗什的梁启超，称泰戈尔“老戈爹”的徐志摩，其他还有辜鸿铭、溥仪、陈三立、张君勱、章士钊、梁漱溟等，而这些人当时所代表的思想本就已受到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反对，泰戈尔与他们朝夕相处，吟诗唱和，不但自身难免要沾上晦气，而且也使梁启超们受到更猛烈的攻击。

责任与信仰——梁启超为什么欢迎泰戈尔

针对泰戈尔和自己的激烈批评，梁启超不会不知道，不过他并未为自己辩解。实际上，于情于理，梁启超对泰戈尔都会由衷地、真诚地欢迎。

① 瞿秋白：《太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向导》，第61期，1924年4月11日。

② 沈泽民：《太戈尔与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

③ 徐志摩：泰戈尔《清华讲演》之“附述”，《小说月报》，第15卷10号，1924年10月10日。